

FENGYUDONGJINGLU

風雨東京路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著

文献资料

一衣带水

东瀛抒怀

采写漫记

鉴史镜今

峥嵘岁月

人民日报出版社

风雨东京路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东京路 /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15-3841-3

I. ①风… II. ①北…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
—史料—现代 IV. ①D829.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1360号

书 名：风雨东京路

编 著：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

出版人：董 伟

责任编辑：程文静 吴立平

装帧设计：阮全勇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3530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078mm 1/16

字 数：470千字

印 张：28.5

印 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841-3

定 价：68.00元



1964年4月13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等日本朋友。中日双方经过协商，就廖承志办事处与高崎达之助办事处互派代表和互设联络处以及中日互派记者达成协议。（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1963年6月13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观看庆祝《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十周年展览。

(人民中国杂志社提供)



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田中首相访华的日本记者。

(新华社摄影部档案室提供)



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图为邓小平为日本记者俱乐部签名留念。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时与中曾根首相挥毫题字，表达了要使中日友好永远传下去的共同愿望。（李守贞摄）



1964年9月29日晚，首批中国驻日记者一行7人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受到日本高崎办事处和日本新闻界朋友的热烈欢迎。（刘延州提供）



1995年3月31日，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成立大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孙尚清（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副总编张虎生、新华社副社长庞炳庵，以及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前驻日大使符浩、杨振亚等到会祝贺。

風雨東京路

吳學文題



文
生
於
情
情
生
於
身
之
所
歷

黃宗羲句

邵華澤題詞



邵华泽题词：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

甲午冬

吴学文



创
新
无
尽
练
笔
成
锋

吴学文题词：创新无尽，练笔成锋

峥 嵘 五 十 年



奮 筆 東 濺 負 一 肩
風 雲 翰 墨 緣

偶成漢俳一首以纪念中国记者驻日五十年

乙未年夏

劉德有



峥嵘五十年，奋笔东瀛负一肩，风云翰墨缘。
——为纪念中国记者驻日五十年 刘德有题写

贺中日互派记者五十周年
柯良书

宣中日互派记者五十周年

丁未年 柯良书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贺中日互派记者五十周年

柯良书

《风雨东京路》编委会

编辑顾问： 刘德有 新华社前东京分社首席记者、文化部前副部长
吴学文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前法人代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
王泰平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顾问、外交部前大使衔总领事
步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主编： 孙东民

执行主编： 王大军 苏海河

编辑委员（姓氏笔画序）

王大军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副会长、新华社前东京分社社长
孙东民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法人代表、人民日报前驻日首席记者
李守贞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新华社译审
苏克彬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副台长
苏海河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秘书长、经济日报高级记者
张 哲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人民中国杂志社译审
唐 晖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
傅 颖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室副主任

监 修： 孙文清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
刘华新 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监事长、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

卷首絮语

光阴易逝，岁月无声。中日互派记者50年、中国记者常驻日本50年。回望这半个世纪的历程，作为亲历者，我们深切怀念过往；作为编辑者，不时超越时空，热诚与同道交流。

记者与常驻

新闻记者是时代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记者以强烈的使命感接近庙堂、深入大众，服务于社会、为受众负责，可谓“忧乐关天下”。历史给了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见证中日关系的机会，让我们见证人民如何创造历史。

中日互派记者，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日对立的状态下，经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后实现的。1964年4月，在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主任的关怀下，中日双方就互设“廖·高崎贸易办事处”达成协议，并交换了互派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这两件事成了中日关系从单纯民间往来到半官半民交流阶段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中日关系全面正常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互派记者是两国民众所愿。由于有了常驻记者，一改过去只能“隔靴搔痒”般地间接报道对方国家的情况，通过记者的零距离接触、观察并及时报道最新社会动向，促进了相互了解和沟通。

中国驻日记者50年，足迹遍及列岛南北。在中日关系的舞台上，近距离见证了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两国领导人互访、日本政局与社会的变动、中日人民结好的动人故事，还有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为侵略翻案等等。50年间的海量报道，融进了现代中日关系史，成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催化剂。

从1964年到2014年的50年间，中国驻日记者从首批“七家七名”，增加到目前的15家机构、时常约有40名记者活跃在采访一线。驻日初期，中国记者团各家记者都在惠比寿的新华社东京分社“一个锅里吃饭”。中

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各新闻机构开枝散叶，陆续走出惠比寿独立。在时阴时晴的中日关系的政治气候下，记者穿梭于北京与东京之间。至2015年7月，累计已有220多名记者驻日，其中有不少“二进宫”“三进宫”甚至“四进宫”者，他们把青春岁月编织进了涉日报道之中。

对于常驻环境，有编委回顾，两国建交前处于敌对状态，日本称中国为“中共”，我则称其为反动政府。中国记者外出采访时，日本当局派众多便衣警察监视盯梢，大有进入敌区和深入虎穴的感觉。建交之后，环境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

另一位编委说，由于记者的工作本质上是“了解情况”的，当局的不放心或许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两国关系的好坏是否就是放松监视的尺度呢？也未必。80年代中期是中日关系的向好时期，那时接打电话，常常有声音突然变小的感觉。曾与同伴采访本（州）四（国）架桥，多年后日本朋友相告：“日本警察那次对你们是有监视的。”

报道与传播

有位前辈记者回顾：驻日新闻机构属于传媒行业，派出的记者都是优中选优。虽然现今是平常事，80年代以前可是个让人羡慕的职位。团结、忠诚与奉献构成了共同底色。中国的涉日报道基本上是“正面报道”，以惩恶扬善、友好睦邻为主。不给对方出丑，不追逐奇闻异事；对日本国民温情面对，对仇视中日睦邻、煽动战争者义正辞严。

战后的日本，反战和平力量与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势力长期并存。两种力量的长期较量构成日本社会的一大特色。大国关系等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两种势力的消长。

中国的涉日报道可谓独具特色。把握导向，引领舆论，与人为善、以邻为伴，是非明晰，爱憎两分。报道中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也是对正义人士以评价，给右翼势力以鞭笞。

注重对新闻背景做深入剖析，是新闻报道的高境界。一般来说，如果只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问题，其稿件可能会令人觉得刚有余而柔不足；如果只从文化传统角度看问题，又可能是柔有余而刚不足。刚柔并济，既从政治体制又从文化传统角度观察问题，也许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五十年的时空，新闻传播手段也与时俱进。一位老前辈为之感慨：读了几位年轻同行写的文章，仿佛觉得像一个常年屈居斗室的人，突然眼前展现了一片碧蓝的汪洋大海。

老前辈回忆，20世纪60~70年代初到东京时，要把汉字稿件译成明码电报，再送到东京的国际电报局，然后转发新华社。不但时效差，而且价格昂贵，上万字的稿子所需费用，有时甚至可以买辆汽车。

现今，信息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采访报道、传输手段日新月异，多样而便捷。媒体融合、报网融合的大趋势，不断颠覆着传统观念。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为代表，革新图存，改变单一的平面新闻报道形式，搭乘“互联网+”高速列车向全媒体转型，“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移动客户端）平台的使用，即是媒体融合下的网络传播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连动变化。

信息时代，也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发消息、写通讯、拍图片、录视频，一线记者开始向“全能型”发展。只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传播方式怎样进步，新闻的根本原则是永远不变的。新闻报道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有大局观、学养、深入了解对方国家社会文化的高素质人才。更为关键的，是铸造永远追求真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人的灵魂”。

冷观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从地理上讲没有选择的余地。既如此，寻求睦邻、和平相处就是应有之义。但是，邦交正常化以后保持多年的良好的中日关系，近年来却发生了退行性变化：战略猜疑多于战略信任，战略竞争多于战略合作。“一衣带水”“世代友好”口号很少提及，两国民众多数都对对方国家持负面印象。

“北京—东京论坛”，是研讨中日关系的重要公共交流平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成为2015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论坛的主题词。面对目前僵冷的中日关系，两国有识之士都有危机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上大声疾呼：破解亚洲和世界的难题，日本和中国没有时间争斗。摆脱目前的困境，以相互合作取代相互仇视，是时代的要求。他痛陈日本历史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陶醉于一时的成功，缺乏历史观、大局观，只考虑自己，看不到世界的全局。为了不再重蹈历史覆辙，日本应当客观看待历史，从历史中学习。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在讲话中指出，日本当局不愿倾听中国的关切，却渲染中国威胁日本，中日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她认为，面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周边乃至世界情况的新变化，有必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观察中日关

系，回归互惠合作的轨道。

中国与日本百年恩怨。中日关系退行到今天这种地步，是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

历史问题及历史遗留问题，是阻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罪行累累。战后美国出于冷战目的，放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清理，右翼势力得以死灰复燃。他们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煽动仇恨，蛊惑人心，迷惑了不少人。对此，日方非但没有一个清楚的表态，反而不时触痛中国人民心头的伤痛。近年来中国、日本、美国等大国关系的变化、实力的消长，改写着亚洲的政治地图，中日关系面临重大考验。由于日本战后对其侵略历史没有认真清算，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成了中日关系中的夹生饭。日本现政府罔顾历史事实，拿钓鱼岛问题说事儿，宣传日本的“安全危机”，使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对待历史，是日本人患有历史健忘症，还是中国人“记仇”？

有编者说，中国人对日本真是仁厚有加。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日本人来中国，见面就对过去侵略中国鞠躬道歉。中国人见此，就说：“过去的事就过去算了，要向前看。”且勿以为历史可以勾销，反省与谅解应该是双向的，反省是前提，道歉要真心，发展中日关系应该相向而行。陈毅元帅在60年代就说过，他赞成加害者不忘罪责，受害者不计前嫌。中国反对延续民族的仇恨，着眼未来，放弃赔偿，以德报怨。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与日本交往应以正直相对，以礼相交，不卑不亢。

编者认为，发展健康的中日关系，需要准确把握中日关系的大局，对日本社会要清醒观察，既要看到右倾化的倾向，也应看到日本国民中追求和平的健全力量，右倾保守势力与主张和平反战的力量在日本社会长期博弈。日本的真正出路是放下历史包袱，肩负和平责任，与东亚各国睦邻合作，这样才能轻松前行。应当看到，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合作、和平与发展，中日关系向何处去，终究掌握在两国人民手中。

中日新闻交流

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从互派记者前就已有之，特别是在邦交正常化之后更为频繁。90年代初，一些常驻日本的记者回国后，酝酿组建了一个中日新闻界交流的平台，1994年7月正式成立了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团体虽小，却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创